

■关注

艺术眼光与学术勇气

——谈赵霞的儿童文学研究 □刘秀娟

《文艺报》创刊于1949年9月25日，与新中国同龄，今年迎来了70华诞。赵霞的文集《儿童文学观察》，就是要以一位年轻作者的立场，向一份历史积淀深厚的报纸，表达敬意与谢意。这些文章是一个青年学者10年研究与成长之路的履记，同时也是《文艺报》发现和培养青年学者、坚守“儿童文学评论”园地的见证。正是从《文艺报》开始，赵霞开始释放她积累多年的学术准备，以扎实的学识与敏锐的观察，以她特有的笃定与自信、羞怯与谦和，成长为儿童文学研究界令人惊喜并被寄予厚望的青年学者。

赵霞在《文艺报》亮相的第一篇文章，便是《当下儿童文学批评的难度》。这篇文章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宏观又精准，我甚至有点隐隐的激动，在当时话语疲弱、人才断档的批评环境中，她像一株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让人欣悦，长久的地下储备给予她充沛的面向未来的力量。也是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建立起一种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即便在今天来看，10年前的这篇文章对于儿童文学批评仍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她所提出的问题既是当下性的，也是长期的问题，如若不是，也称不上是难题。从这个角度而言，10年的时间倒是给了我们去评断一篇文章的预见性、穿透力和有效性的恰当维度。

她提出的第一重难题便是无可逃避的商业语境对儿童文学批评的挑战。围绕儿童文化商业化的趋向，《文艺报》组织了一系列文章，王泉根、刘绪源、郑重、杨鹏等几位师长，包括我本人，都参与了这场争论。这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有个叫赵霞的女孩一直在观察、思考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且犀利地指出，这场讨论，虽然热烈，却并没有进入理论交锋。赵霞虽然没有在当对这个话题发表看法，但是在完成了2009年的这篇童诗研究提出了一个触及根本的问题——商业语境，并且先见地做出笃定的判断：“这种语境的变化甚至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撼动着传统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和价值评判体系，也从未有过的力量影响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当下面貌和未来

命运。”10年后的今天再来看赵霞的判断，既为她的研究能力所折服，又为我们没有重视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改变而遗憾——到今天，这样的现实已经昭然若揭，无需遮掩。商业语境对于创造力的释放、对于文学评价标准的撼动，甚至对于作家和研究者文化使命的挑战，是我们身处其中的越来越清晰的现实。

当我们敏捷而迅速地转向其他热点时，赵霞沿着这个方向深挖了下去。2015年，她出版了《童年的文化影像》，2017年出版了《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在儿童文学、童年文化、消费现象、视觉影像、新媒体之间的关系研究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也是将西方文化研究成果和方法实践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虽然在学术界也一直有对泛滥的文化研究之有效性和工具化的反思，但对儿童文学来说，文化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也是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与“主流”学术研究始终缺少对话、难以平起平坐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在文化研究的视角之下，不存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区隔，无论从童年文化的视角去研究成人文学，还是以社会语境的视角观察儿童文学，都会给我们提供新鲜的切口，便于我们走近这个时代儿童文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特意提及赵霞在童年文化研究上的用力，并非鼓吹以文化研究来替代审美批评，事实上，对儿童文学来说，两者不是此起彼伏，而是都很薄弱。

赵霞的出场和我们大多数人不同。我们往往循着“单篇作品评论—作家论—现象论—总体性研究”这样一个路子，是从个体到总体的一个积累过程，在持续多年的批评实践和现场介入中我们才逐渐建立起（还不一定是完整的）个人的儿童文学观。赵霞恰恰相反，她并没有过早地介入儿童文学批评的现场，而是在完成了对儿童文学和艺术学说的系统学习，有了整体性认知和把握，有了充足的文本阅读之后，才进入到批评现场，尤其难得的是，她一直保持着对美国儿童文学研究刊物的系统阅读与思考，她的知识结构、视野、方法足以支撑她对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研

究的现状进行整体性的判断。越是她早期的文章中，越能发现她的宏观性，发现她的学术勇气与野心——在她性格所带来的温和与周全叙述当中，仔细阅读，会发现她观点上的尖锐性，她其实是带着对现状的不满而立论的。比如在2010年《历史·现实·本土——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走向的思考》中，她提出了儿童文学批评如果不能将捕捉热点现象的热情有效转化成系统的、翔实的、周密的研究论文，儿童文学批评会在这样轻浅的滑动中，日益损耗着自身的理论能量。她还提出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儿童文学长期被视为“小儿科”，和儿童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水准较低有关系，理论批评在作品的“经典化”路径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赵霞的参照是《小红帽》《海的女儿》《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地海传奇》等西方作品的经典化之路，其实如果我们拉近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这个问题更容易理解，对我们的激励作用更直接。再比如，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她提出，新时期以来，甚至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足够重视的问题：我们的童话写作承接和发展了来自西方的现代童话幻想传统，却无法对应现代童话背后那个深厚的精神基底，这导致了当代童话在熟悉了现代童话写作的基本门径之后，却长久地徘徊在幻想技法的反复演练上。“在今天的一部分童话写作中，我们不难看到，随着童话的幻想被不断地精致化，它朝向现实的面孔也在不断地虚化，许多充满灵光的想象和语言，却始终切不到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深处。”这是关于当下童话（包括玄幻小说）与现实生活关系的精辟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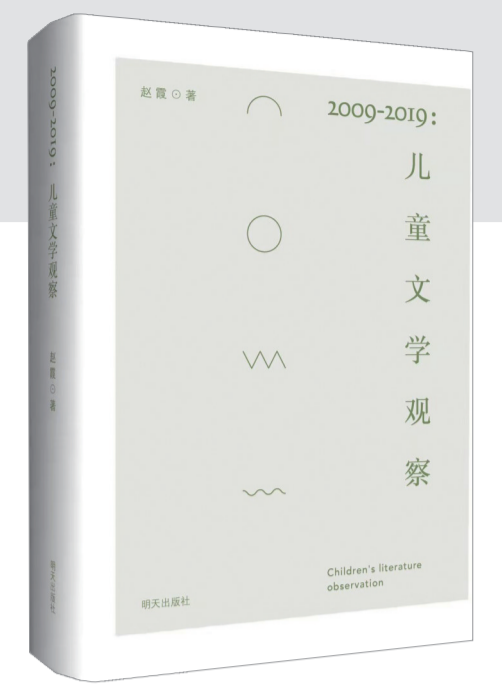
赵霞一直有种期待，就是学术研究与实践实践的相互支撑。她自己会有意识地针对作家新作进行文学内部的研究，侧重审美批评与文本细读。这部分文章中，虽然对黄蓓佳“5个8岁”系列长篇小说的评论发表时间更早，但更接近她批评理想的是对刘海栖《扁镇的秘密》的批评。在《当代童话的叙事革新与困境》中，她很有冒犯精神地对我们的师辈作家刘海栖童话的现代性探

索进行了得失之辩，毫不扭捏地指出这部童话在艺术探索上，大量借用西方作品为潜在语境，对中国读者而言是陌生而无效的经验，同时，它在后现代手法的使用中消解了意义，而没有重建起自己的价值。赵霞的勇气值得嘉许，但更让我感动的是刘海栖老师的宽容，无论对作者，还是对编辑。

在从事研究的同时，赵霞也开始了散文写作。虽是她的另一副笔墨，却始终围绕童年命题，其实是她研究的另一个入口，来自自我经验的、现实生活的入口。散文里的赵霞，细腻敏感，对童年生活、儿童心理有很强的感应能力和同理心。尤其是做了母亲以后，赵霞有了更丰富的、直接的童年感受，既有普通妈妈那种天然的幸福与沉迷，也多了一个直接的、耳鬓厮磨的研究与实践对象，这种爱与关切会触动她写下更多美好的作品，也会启发她更开阔的研究思路。

在散文《卡夫卡和小女孩》里，赵霞曾经写道，卡夫卡和小女孩这段传闻无论有多少个版本，但它始终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文学——以及以文学为代表的整个人类文化——对于孩子这样一种微小存在的深深关切。因为这种关切，“1923年的卡夫卡，怀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虚弱与绝望，走在柏林的街路上，她看见了孩子的眼泪。”这同样是赵霞从事研究和写作的核心，也是我们所有热爱儿童文学、关心儿童文学的人们核心——但是今天，我们也需要时常自问与自省，最初的爱与关切还在吗？我们的内在驱动力是否蜕变？

资本和媒介对儿童文学、儿童文化以及整个社会文化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现代化、信息化、商业化、全球化、智能化、贫富两极化、知识碎片化等不同维度的力量交织在我们的生活中，儿童文学研究者如何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发声？这是考验一个学者、一个评论家学术自律与艺术眼光的时刻。赵霞有天分，更重要的是她有执著而坚定的目标。她既是儿童文学一个时刻在场的观察者、研究者，同时她又很疏离，疏离于很多



热闹之外。她不怕“失去”和“耽搁”，直到今天，她仍能做到不使用微信，起码不用它来进行社交。这是她的自律和自我认知。她不使用不代表她对最新的文化语境、文化传播方式不关心，一部老式的非智能手机并没有阻碍她对最新的媒介文化的观察，她只是比我们更加警惕、更有决心避免“陷入”。这种态度是她对待很多事情的态度，她会把有限的时间精力，全身心地专注于一件事：感受和研究童年以及儿童文学。

和赵霞一样，《文艺报》对我来说同样是启航之地。从2005年开始，我开始担任儿童文学版的编辑，开始了人生中第一份职业。儿童文学评论版创办于1987年1月24日，她的诞生得力于束沛德老师等前辈的极力促成，并受到整个儿童文学界的热心支持，冰心老人亲自题写了刊头。30余年来，她曾有过经济上的危机，有过编辑人才的断档，有过办刊思路的调整，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岌岌可危，但是无论处于怎样艰难的境地，《文艺报》都没有放弃她，并且在2010年增设了“少儿文艺”专刊，使得这块园地成为儿童文学界最持久、最稳定、最具风向性、最有凝聚力的理论和评论园地。因此，在她迎来70华诞的时刻，赵霞由明天出版社出版这部献礼之作，是替我们所有人道出了心中的感谢。

■聚焦

中国儿童诗歌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

——首届“童诗现状与发展”研讨会在安徽宏村举行

8月21日，由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丹曾人文学院承办的首届“童诗现状与发展”研讨会在安徽宏村，来自北京、上海、安徽、浙江、四川等省市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内外的60余位儿童文学作家、童诗翻译家、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展开学术交流，共同讨论当代中国儿童诗歌写作及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走向，这是在中国首次举办的国际儿童诗歌专题研讨会。

在20日上午的研讨会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李琦，安徽省县领导依次致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方卫平、童诗作家邱易东、美国佐治亚州南方大学文学与哲学教授Richard Flynn、北京大学教授赵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树才、日本城西国际大学教授、翻译家田原等应邀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作部研究员马亚琼主持。

蒋朗朗在开幕辞中提到，诗歌是心灵的写照，而童诗承载梦想与纯真，在心迹双清中我们开始成长，文明由此滥觞。童诗不仅仅是成长教育、素质养成的重要载体与形式，其蕴含的审美特点、想象方式、传播途径及写作意涵，都应成为诗歌写作与研究的重要关切。童诗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探求初心的追寻，不仅要通过探究肌理，认识特点，还要在理论解析形成体系上做文章。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每一个人都离童诗很近，每一个人都因为童诗而记住成长的美好。童诗不曾与我们远离，因为守住初心，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

童诗写作的美学向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随着时代思潮、社会经济、政治生态及文学文化观念的变化，中国儿童诗歌也经历了曲折而跌宕的发展历程，从圣野、任溶溶、鲁兵、柯岩、金波等作家开始，涌现了几代诗人，带来了硕果累累的文学成就。但是，中国儿童诗歌一直作为儿童文学的一部分，匮乏独立和清晰的创作学理、理论支持。

在这一背景下，讨论儿童诗写作中的美学向度问题适逢其时，这对于当下时代儿童大众的童年处境探寻、社会公众的儿童观念塑造等诸多面向，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文化意义和方法论价值。

邱易东从儿童诗作者的视角进入新诗现场，言辞恳切地指出很长时间以来儿童诗的辉煌面貌是写作者的自娱自乐，一直以来，童诗写作与研究都欠缺明晰的批评声音。当代中国儿童诗歌写作存在着将“诗性”与“儿童性”本末倒置的创作倾向，这使得大多数的童诗非常同质化。童心是儿童诗的本质，是自然与人之间的交流的反射，回归童心“求真”，诗人只有用真情和实感面对世界、回归自然，才能找到真正的童心。

同时，我们研讨童诗应该在世界视野的前提下开展，想要鼓励作者写出纯正、优秀的作品，让我们的童诗变成真正的诗，真正走向世界，应该更多地向大家推荐世界级的优秀诗歌作品。

方卫平表示，从五四以来到当代中国儿童诗歌理论的核心及童诗美学的基本母体，是“童年性”和“文学性”这两个关键词。怎么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是当代童诗书写者和研究者的必修课。从诗歌实际来看，“童诗”首先强调的是诗本身，童言童语中的诗性是构成中国当代童诗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童诗美学的建构仍然还在路上。而从诗歌教育的现场生态来看，童诗的理论建构与写作实践还需要更加民主和客观。在谈到童诗现状时，方卫平还指出，对于中国童诗来说，这是一个新生的时代。首先，童诗进入课堂、校园以及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这是自五四以来到当代儿童诗歌生活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次，童诗的出版具有很高的文化热度。诗人们给孩子们编写的诗集爆款频出，更有甚者，在出版一两个月内就能达到20余万册并多次印刷。而且，这样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必将为中国童诗的发展打开更为开阔的格局，我们躬逢其盛、与有荣焉。

儿童诗歌的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学传统和表达形式，回顾中国童诗的发展历程，中国儿童文学及精工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传承先秦以来农耕时代的民间童话、童谣，到了现在又以开放的胸襟汲取了以欧美、苏俄为典型的儿童文学精华，形成了自己现代性的平衡。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到今天，我们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光荣的荆棘路，创造了很多辉煌的成就。因此，在深思现实、展望未来的同时，我们也必有必要回顾历史，中国的儿童诗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现代性的儿童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的开创是一脉相承的。

金莉莉在发言中回顾了自“儿童诗”概念的首次使用到当下的儿童诗歌研究历史，带领大家重新回到五四儿童诗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现场，凸显儿童诗歌从新诗过渡到新的诗体的过程中产生的启蒙贡献和抒情困境。一方面，金莉莉强调了儿童语言和思维在建构民族形象和文化变革中的特殊价值——“真”与“情”，也强调了现代儿童意识出现对诗歌发生的重要意义，即现代中国对儿童的思考和表达不仅催生出了儿童诗，而且拓宽了现代白话新诗的写作路径；另一方面，她也指出了儿童诗无法回避的表达困境，即五四儿童诗歌因更加密切地与成人文学的渗透和互动，而在开端期的文体界限和美学特征变得模糊，很难作为儿童文学的标志文体受到重视。

来自美国的儿童及青少年文学研究者理查德·弗莱恩(Richard Flynn)对美国20世纪中期为儿童写作的成人诗人较为感兴趣，因为他



们在诗中令人信服地为成人虚构了一个童年世界，由此，他提出了由成人创作的儿童诗歌中的重要概念——“交叉写作”。指的是年长者的声音与年轻者的声音在文本中构成了对话综合体，两者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影响，在美国作家——尤其是非裔美籍作家们的儿童诗歌、回忆录以及自传等文本中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交叉写作”是在我们讨论成人创作的儿童诗歌作品时不应忽略的概念。同时，理查德还指出，美国当代文学中儿童小说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儿童文学的代名词，他据此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撰写儿童诗歌重要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为孩子的写作不应该被边缘化。儿童诗歌在儿童文学中的尴尬位置反映了诗歌以及整个人文学科在美国二战后文化中的边缘化状态，在当代美国的文化氛围中，公众和诗人之间已然存在着明显的对话断层，甚至可以说，诗歌在美国已被视为一种商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新探讨童诗的现状与发展，就有着不可小觑的时代价值。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给予儿童什么样的儿童诗？张国龙结合自己培养孩子进行童诗写作的切身经验，生动、具象地就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他认为，儿童就是一首诗，而给儿童选择诗歌作品的三个重要标准分别是：第一，儿童诗必须要出乎意料，不可以仅限于文字上的通俗易懂。成人诗歌中的每一个面向，在儿童文学中的诗歌中都有所涉及，因此，我们对于儿童创作的“灰色童谣”要有充分的理解和宽容；第二，儿童诗应该强调稚气而非傻气，让儿童诗作的艺术品位“低弱化”，更不要低估儿童的审美直觉能力；第三，儿童不需要熟悉的平庸之作，而需要不熟悉的新奇之作。这样的标准才可以为儿童提供

能够引起共鸣、共情、实现情感宣泄的好作品。

王泉根的发言涵盖了现代中国童诗研究的两个重要面向，其一是对于“童诗”的概念与界定应该着眼于“诗性”和“儿童性”。文学在最艰难的时候都会回到原点，到底什么是儿童诗，儿童诗的价值是什么，儿童诗与儿童的关系又是什么，这是我们儿童文学研究者应该审慎思考与密切关注的最核心的终极问题。他认为，倘若要回答前述问题，应该从哲学，也就是矛盾的维度去寻找答案。从普遍性的意义来看，儿童诗首先应当是诗，正如儿童文学首先应当是文学。其文学性应该包括虚拟性、形象性、情感性和语言性等几个方面，并表现为形式美、生命美、语言美等多种面向。把握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也就是把握了儿童诗的诗性，因此，童诗作者首先要成为诗人，进而再去理解儿童和儿童性。其二是应该正确认识童诗的“世界性”。世界性的文学至少包括两个门类，第一类是儿童文学，当人类对自己的生命传承与延续，即儿童与儿童世界的时候，是能够找到最大的利益共同点的；第二类是科幻文学，因为人类面对灾难危及生命时的恐惧感和危机感也具有跨越国界和种族的一致性。世界性的儿童诗歌背后应该是世界性的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的互鉴和交流。

童诗教育与翻译的意义可能

中国是“诗教”大国，诗歌的功能显现于政治、伦理、教化乃至社会交往等诸多面向。重视诗教，就是重视诗的教化功能，重视诗在儿童教育中的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王宜振从童诗编辑的视角出发，追问我们必须

须要思考开展诗教的意义。他在发言中指出诗教对今天儿童的作用体现在许多方面，它有利于儿童学习祖国的母语，可以呵护儿童童年的梦想，能够开发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助于孕育和陶冶儿童的情感，更重要的是，诗教可以推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普及和传承。随着诗教的普及和深入，中国童诗一定会从“边缘化”的尴尬处境中走出来，走向发展和繁荣昌盛。

儿童就不能写诗吗？诗人树才结合自己近年来教授孩子们写诗的心得体会，提出为孩子们开设诗歌课程的重要意义。童诗的写作主体可以从成人过渡到儿童身上，童心、童语本身就是童诗，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诗歌的守护，即使童年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消失，童心却永远不会。金本则认为，童真就是儿童诗歌的生命，童诗应该是儿童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不能按照成人的思维臆想出来。只有学会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学会以儿童作为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儿童诗歌的写作、研究和童诗教育才能走得更远。

童诗作为各国文学艺术之根，加速、加大中外儿童诗歌的互译和出版，是每个国家最本真、最友好而又润物无声的文化传播。舒伟从童诗翻译的历史现场出发，以时代变迁中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童诗和童曲及其汉译为主题，为我们梳理了从清教主义儿童文学开始到现当代英国儿童文学的主旨差异及艺术表达特征，展现出儿童诗歌翻译实践中的异化、归化和优化等文化策略。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下的童诗翻译仍然良莠不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面临着机遇与挑战。薛卫文在会议上表示，略去“五四”催生的白话文等内源性因素，中国新诗最大的“老师”应该是翻译诗，但是，翻译的功德和翻译的无奈一直形影不离，一些丧失民族文化自信的盲目推崇，一些不得精髓却沾沾自喜的邯郸学步，诗歌美学及诗歌翻译中的“殖民化”，让中国新诗，尤其是童诗，又增添了许多弯路、歧路甚至是邪路。

在研讨会的闭幕式上，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与中共浙江省兰溪市委书记陈峰齐签署了《童诗中国论坛永久落户兰溪》协议，并分别向安徽宏村和浙江兰溪授予“丹曾人文(宏村)学院”和“丹曾人文(兰溪)学院”匾额。黄怒波告诉记者，国内最高层级的国际儿童诗歌学术会议——“童诗中国论坛”将于2020年在李渔的故里浙江省兰溪市举办。令人感动的是，多年来默默致力于儿童诗歌创作与研究的作家、学者能有如此之高共识，这是文化高度自信的具体体现，亦是对中国儿童诗歌建设这一新时代文化世纪工程的高度认同，可以说，中国儿童诗歌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

从儿童诗歌开始培育一个民族的审美能力，关乎到民族的未来、社会的和谐，中国当代的儿童诗歌创作与研究应永远走在路上，只有一直在路上，我们才能不断地探索、思考、对话和争鸣，才能不断地带来创见与新意。（教鹤然）